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百二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政坛琐记

- 抗战初期在安徽..... 章乃器(1)
与杨虎城共同反蒋的片断回忆..... 连瑞琦(18)

金融絮语

- 我与富滇新银行..... 缪云台(38)
中法储蓄会内幕点滴..... 李文杰(52)

文艺科技

- 皓首忆童年..... 钱松岳(62)
困学求知回忆录..... 张明觉(80)

人物述林

- 邓演达被害记..... 萧翰香(88)
 心中只有老百姓——祸患生于肘腋——卑劣而凶
 恶的勾当——历史的恶作剧——铁骨高风——营
 救与追悼——叛徒的可耻下场
东京之三年..... 章宗祥(102)

外交生活溯源——交通银行借款记实——参战逸
史——复辟问题小记——议和专使过东记——退
还赔款索隐——各种借款内幕纪要——他山之石
撮要

张治中生平大事记(上) 余湛邦(169)

政坛琐记

抗战初期在安徽

章 乃 器

这是作者 1968 年写的一篇自传，主要回忆了 1938 年在安徽任财政厅长期间的一段经历。

1937 年 11 月，我从上海撤退到香港。不久，李宗仁派他的亲信韦永成和黎蒙来找我，要我去安徽任省政府秘书长。他们说，李已奉命兼任安徽省主席。由于他的主要职务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军务十分繁忙，分不出多余的时间管理省政，秘书长要代行省主席的职权。他们认为这个任务意义重大，要我务必答应，而且即日动身同他们一起去。

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了必要的基础，但亟待充实与巩固。国民党当时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但民众没有唤起，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没有改进，战争就不能胜利。因此我们如能引导国民党内的各派在开放政权和唤起民众两个方面展开竞赛，把局限于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改变为全民动员的人民战争，这对于充实和巩固统一战线，保证抗战的胜利，是会起到重大作用的。在这一点上，李宗仁所代表的桂系显然是有可能同蒋介石的中央展开这种竞赛的。

我们同桂系还有过一段足以称述的往来，那是在 1936 年“两广事变”发动后，李宗仁和白崇禧曾派陈劭先到上海，要求沈钧儒和我去广西参加他们的运动，而且指名要我当财政部长。

我们因为这同救国会一贯主张的团结御侮方针不符，没有同意，而且去电要他们顾全大局，审慎运用他们的实力地位，以争取举国一致的抗日战争的来到。这种严正的态度，应该可以使李宗仁对我有正确的认识，成为日后工作上合作的良好基础。事情是有希望的。

在主观意志上，当时我抗敌救国热情高涨，达于极度，认为我等既奋不顾身，力争全面抗战于前，现在抗战已经实现，就应该献身于抗战事业，以共谋必然胜利之实现于后。所以，当时一心就想奔赴抗战的前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毫不计较条件和地位。安乐淫糜的香港，我是片刻都不愿停留下去了。这样我很快地答应了，而且两三天内就同他们一起动身了。我同他们两人先到武汉，逗留了一些时间后，就同车去徐州。

在武汉，我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他嘱咐我两件事：一、彻底执行释放政治犯的指示；二、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关系。这两点，本来在我的思想上就列为头等重要的任务。有了他的嘱咐，更增加了我完成任务的光荣感，干起来就更有劲了。

我是在徐州过春节的。在徐州，初次会见了李宗仁。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朴素、谦虚。他对我表示了开放政权和唤起民众的必要和决心，并举出事实：一、省政府人事，除我以外，还邀了参加青年党的十九路军将领丘国珍任保安处长；二、已决定成立省民众动员委员会。

过了两三天，李就和我同车去六安——当时安徽省会已由安庆撤退到六安。到六安的第二天，李就满怀歉意地向我申述，蒋介石不同意我任秘书长，只同意我任省政府委员会委员。因为没有适当的人，他仍要求我代理秘书长。这样我就代理了半个月的省政府秘书长，等待朱佛定的到来。这时，李聘我任省民众动员委员会的秘书长。这可能是对我的一种临时安排。

我就任省民众动员委员会秘书长职位时，同救国会时期的老友周新民谈了话，得知会的上层组织已经安排好了，他任动委会

的组织处长，会里的架子已经搭起来了。

周新民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他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因为他很审慎，人事关系也好，大革命失败后得以隐蔽下来。他是救国会的发起人之一，实际上是推动者和领导者；1935年末、1936年初之际，因为怕暴露，才被调离上海的。我在谈话中了解到，他已经掌握了动委会的全部会务，对此我感到快慰。以后，我对于动委会就只做些承上启下的工作和批阅重要文件。当然，更重要的是顶住外来的歪风；一般日常工作就完全放手让周新民去做了。我没有在会办公。经常和我联系的是干事狄超白，他也是共产党员，而且也是救国会成员。

但我并没有能闲下来。几乎是同时，财政厅长杨绵仲辞职了，而且去意很坚。这是一个实权比秘书长还要大的位置，李宗仁没有勇气推荐我去继任，而是向蒋介石要人。蒋派不出人，要李自己找人。李在桂系内部也找不到人，于是就找到我。

在那兵荒马乱的时候，战地财政厅长本来是一个危险的岗位。当时，安徽肥美的市县已全部沦陷，收入不及原来的半数，而支出如故。职工军警的欠薪欠饷已达两三个月。所以，连在国民党内号称地方理财能手的杨绵仲也束手无策了。我是一个生手，怎能贸然顶上去呢？不是怕牺牲，怕的是牺牲了自己还搞坏了工作，那就真太没法交待了！我不能不推却。但李逼得很紧，认为这是关系到他在安徽的成败关键，非由我去顶不可。于是有人向我献策：先邀集财政厅的科长、秘书恳谈几次，摸清了底，再定进止。我照办了。恳谈的结果，得知安徽财政的贪污、浪费很大，如能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事情还是可以做好的。这同我平时对于国民党财政的一般认识和到了安徽以后所得到的反映是一致的。

于是，我就向李宗仁提出铲除贪污、节约浪费等四项就职条件。李马上全部接受，而且表示全力支持。这样，我才就任财政厅长。

在下一次的省务会议上，李宗仁郑重宣布了铲除贪污和节约浪费的方针，认为不仅是省财政的主要方针，而且是战时省政治的重大方针。我宣布了省财政在省务会议中彻底公开，打破过去财政部门用款优先的“近水楼台先得月”恶例。财政厅的经费收支也彻底公开，包括厅长的办公费，打破过去厅长包办经费的恶例。同时，由李以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名义，发通电给全省的专员、县长和保安团队，宣布贪污有据、浪费严重和扣留应该上交的税款、公款的人员一律按军法惩处。

这一措施立刻得到振奋人心的广泛影响。许多人写信给省政府和财政厅，愿意牺牲生命以帮助这一方针的贯彻。在动委会的领导下，青年们的情绪更为激昂，他们主张先杀一两个大贪官。军统分子、教育厅长杨廉成为众矢之的。在某一个军官的掩护之下，他悄悄地夤夜逃走了。建设厅长刘式庵也走了。全省的县长、区长、保甲长和税务局长也走了一批。我们查得了杨廉在留学生经费和学校建筑费等项目下，贪污了大批的款项，立即报告了当时的中央政府，要求通缉杨廉归案法办。蒋介石看到众怒难犯，又觉得铲除贪污的好事应由他来做，就在四川捉住杨廉把他枪毙了。

“铲除贪污”和“节约浪费”很快就成为通行全省的两大口号，一时做到前所未有的弊绝风清。财政上首先就收到一大批被各县扣留着的赋税款项，救了省财政的穷。收入增加了，支出减少了。各部门、各级都核实的经费支出，消除了吃空额和浮报开支的漏洞，很快就做到了收支平衡而略有节余，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们以后又创办了敌货、私货及资敌物资的检查工作，一面抗击了日寇“以战养战”的阴谋，另一方面也为省财政开辟了一个新的巨大来源，使省财政达到相当宽裕的境界。我们除了发清前任的欠薪欠饷以外，还增发了军警的衣被，适当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同时，我们还发行了省公债，即以省公债为保证，发行了省地方银行的小额钞票，以润滑当时极端枯竭的货币流通。这样，安徽省就有了一整套的生动活泼的战时财政和金融。这可能是国民党统治区各省所没有的。

我就任财政厅长时所遇到的困难，除了财政恐慌和金融枯竭之外，还有一个干部极端缺乏的问题。财政厅的编制本来有120多人，当时逃走了很多，只剩了七八十人了。县级以上人员缺乏得更严重。创办了敌货、私货及资敌物资的检查工作之后，干部荒顿成为突出的严重问题。

我是只身去安徽的。当时对于财政厅的旧人一律慰留，连照例必须随厅长进退的监印员和会计主任都再三慰留，按照当时的官场作风，这两个职务都是由厅长的亲信担任的。因为我实在派不出人，而原任监印员和会计主任一定要走，这就临时由周新民介绍李文宜（女）任监印员，由吴耕阳介绍陈仲坚（李人俊）任会计主任。这两人我本来都是不认得的。只有一名前任留下来的伺候过谭延闿的名厨，我没有加以慰留。他知道我是不请客的，捞不到油水，申明要走，我很爽快地让他走了，在节约浪费的气氛下，省里也没有人敢留他。

当时在安徽，要补充成百上千的能够出生入死的战地财政工作的干部，显然是很困难的。唯一的出路是大胆任用青年。这点我和桂系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我当时的另一个繁重的工作是接见过往的青年。记得那时过往六安的青年很多，我的住处是一所沿街的房子，人们可以随意进来，真有门庭若市的感觉。

省动委会的实际工作在工作团，工作团多的时候曾到过十几个团，有团员三五百人；他们还联系了为数更多的地方青年。工作团分布在整个前线和敌后地带，他们的工作得到广大群众和抗战将士的好评，当然要遭到反动势力怨恨和攻击。

当时前线和敌后的情况是：国民党党部和官僚行政机构，逃

跑成风，一部分甚至投降敌人成为汉奸，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坚持抗战的。安徽国民党省党部就是一个带头逃跑的机构。战火一迫近，战地县、区国民党党政要人纷纷逃跑，基层党部和在其卵翼之下的基层保甲体系在逃跑声中就几乎全部瓦解了。于是，前线出现了大片大片的“真空地带”——敌人未来占领而基层党政机构已经逃跑一空的地带。“真空地带”实际上并不真空，那里有的是逃不起难的穷苦人民大众，他们只有在当地成为敌我交锋的火线的时候才暂时躲开一下。这种大片大片的地带就都成为工作团青年活跃的自由天地。我军在进军或后撤的时候，找不到保甲长，工作团青年就自动出来为部队服务：买粮、买草、雇民夫、组织担架等。他们把群众组织起来，既便于为军队服务，更便于照常生产和生活，也便于对付敌人。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对工作团都说好，抗战部队对工作团也说好。

动委会组织章程里面规定有县动委会。但县级组织显然没有大量展开，这大概是因为当时的民政厅长张义纯已经对动委会工作团表示不满，甚至参加了省党部对动委会的攻击，县级组织自然就难于发展了，省动委会当时的努力也只集中于工作团，没有推动县级组织的发展。

反动势力为什么要怨恨、攻击工作团呢？因为他们不承认保甲组织的瓦解是受到国民党上层的逃跑主义和亲日派汉奸论调的影响，也不承认保甲长和人民之间的水火关系，而是简单地用“工作团搞垮了保甲组织”为借口，以推诿自己本身的责任。自然，工作团是打倒了一些已经投降敌人或即将投降敌人的保甲长的。这种人平时作恶多端，民愤甚大。群众一经发动起来，他们自然无地容身，投敌或找新“靠山”，本来是必然的。工作团要抗日，当然要打倒这种人，也只有打倒这种人，群众才敢大胆地起来。反动势力以少蔽多，就把保甲组织瓦解的全部责任归之于工作团，而对于工作团在另一方面也帮助了一些坚持抗战的保甲长的情况，则只字不提了。

这件事反映到上层，就成为国民党省党部和省政府民政厅对于动委会工作团的联合进攻。

安徽省的民众动员法令抄袭了广西的老一套，主要依靠保甲组织。所以，工作团依法只能协助保甲，做宣传鼓动工作。但在保甲组织瓦解的情况下，工作团就只能“当仁不让”，把基层行政工作的任务负担起来了。他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赢得了军民双方的好感。具体的形势和有效的工作使得那些顽固派提不出站得住脚的反对理由。

顽固派们只好提出所谓工作团违法越权的问题。我们反驳说：“这首先是区、乡、保、甲长违法失职的问题，工作团只是补救了区、乡、保、甲长的失职行为，而谈不到什么越权。谁能说战地服务能够无人负责呢？谁又能说从负责的精神出发，补救了区、乡、保、甲长的失职行为可以构成违法呢？！所以，说到违法，应该受到惩罚的是弃职潜逃的基层行政人员，而绝不是工作团。勇于负责的工作团应该受到奖励。”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顽固派被驳得哑口无言。

当然，除了日敌要来打击我们之外，顽固派也是要来干扰我们的。反动势力对动委会的攻击是不断的，国民党省党部和桂系民政厅都是厌恶动委会和它的工作团的。除了暗中进行的以外，在各种集会上，一有机会，他们就公开地大放厥词，主要由我给以反击。最猛烈的有两次，都是暗中进行而几乎收到效果的。第一次，是他们说通了当时的省主席兼动委会主席的廖磊，要解散动委会（那时李宗仁已撤退到老河口，廖磊继任了省主席。我已兼任财政厅长，而且在雷厉风行地执行铲除贪污、节约浪费的两大口号之下，已在短期内使省财政由濒临破产好转到收支平衡，廖磊因此对我很尊重）。周新民告诉了我这个坏消息，我即去见廖磊，晓以大义，动以利害，半小时的谈话打消了他的原意，使动委会转危为安。第二次，他们变得狡猾了，不提出解散动委会的主张，而要求由民政厅接收工作团，拆散后交各县编入保甲系

统，以统一组织领导，使得动委会变成只有上层的空壳子。这是一个很巧妙而又很毒辣的计策，我们难以正面反驳。

当时财政系统为要充实业务，更由于要设立敌货、私货及禁运资敌物资检查处，而要大批干部。我们经过商量，提出了将工作团转移到财政厅的对策。这个方案得到廖磊的支持，很顺利地就在上层通过了。

但要求工作团青年们到财政、税收方面去做工作，他们在思想上抵触很大。我同他们谈了几次话，着重说明财政、税收工作同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两大口号的关系，乃至同整个抗战的关系，还说明在工作安排上，尽可能将一个团分配在一个县级机构，保持原来的组织不分散，而且尽可能不脱离原来工作已有基础的地带。这样，终于使他们搞通了思想。于是就由动委会提交给我一张工作团骨干分子的名单，其中有陈国栋、沈兰之、陈穆、陈易（陈有升）等十多人。经过协商和个别谈话，由我分别委任他们充县级检查处长或税务局长，团员由他们相互调剂安排。他们的业务知识，由主管科、局对他们讲解。我特别嘱咐他们要从留用人中寻找一些操守好的、有经验的人员。

这几百人转入财政系统，在当时和以后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们的特点是政治可靠、有初步的社会经验和一定的文化水平。后来干训班财会组招考学员，他们还介绍了许多青年来应考。

就这样，工作团由民众动员工作转入财经工作。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我离开安徽以后，都转入新四军，愉快地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继续从事财经工作。

由于干部缺乏，特别是举办了敌货、私货及资敌物资检查工作后，每天都需要补充人。这就必需公开招收青年加以训练使用。

第一次是由我在武汉登报招考安徽流亡青年回省工作，考取了100多人，其中有周伯萍、程万里（沈鹏奋）、陆连生（陆慕

云)、戴家瀛、知洛仁、孙家驹等等。这 100 多人由江男俊、夏沂率领，跋山涉水步行三四十天，回到立煌后，分配在各科局见习，集中听课的时间很少，短期内就陆续派出工作。这中间也有不少优秀的，但水平高低不一。

动委会工作团的转业和在武汉招考流亡、失学、失业青年，都是 1938 年夏秋的事情。

开办省干部训练班大概是 1938 年秋冬的事。议案是我提出的。班主任由省主席兼任，下面分财会、民政、教育三个组，由财政厅长、民政厅长、教育厅长分兼组长。三个组各自招生、各自管理、各自训练，班主任根本不管。第一个登报招生、开学的财会组，我们招到了二三百人，公认在三个组中是上流的。

条件是艰苦的，住新盖的大茅房，点油灯，吃的主要是粗饭素菜。由于用人急，训练时间只有三个月，主要是学业务；教员由厅内的科长、秘书兼任。政治课每周只有半天，由省主席、秘书长和各厅、处长讲点本省的形势和大政方针，各厅、处的业务和对于财政部门的要求。政治辅导由动委会的狄超白负责，总务由孙诗圃负责。我抽空给他们讲点国际、国内的情况，并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政治课还用半天的时间讲革命的三民主义。

结业后，我指定谭天寿、吴耕阳、狄超白、孙诗圃同所有教员，组织分配委员会，拟定了学员们的分配方案，由我批准后实行。这是一件非常繁重的工作。由于在工作过程中不断结合学员们分组讨论，分配方案得到了全体的好评。

跟着就举办第二期的训练。第二期和第一期大致相同，当然，工作是熟练一些了。由于留下了一些结业学员充任助教和辅导员，人手也松动了一些。有一小部分学员是在训练中就提升为工作人员的，也有提前外派工作的。

大概第二期结业后，我就离开安徽了。

上述的动委会工作团转业，武汉招考流亡、失学、失业青年和财会组训练，是当时补充干部的三大来源。第四个来源是私人

介绍和投奔而来的，可能还不满 20 人。

财政厅的组织，厅长下分设四个科：第一科总务，下面再分文书、会计、总务三个股；第二科收入，下设主任科员，不分股；第三科支出；第四科会计。以后又增设敌货、私货及禁运资敌物资检查管理局。

第一介绍来的是吴耕阳，他是秘书长朱佛定的姻亲，曾干过税务工作。朱佛定觉得把他放在秘书处不方便，就介绍给我。吴做事老练，待人和蔼。当时主任秘书缺，我就任他为主任秘书，但他只愿当一名秘书，主任秘书只允暂代。以后朱家骅^①介绍给我他的亲戚张善璋，我就任他为主任秘书。但不久，张善璋也不愿意干，请求调职，我就调任他为地方银行副行长。我接受了吴耕阳的建议，请继任省主席的廖磊介绍给我一位主任秘书。廖磊介绍了他的军需处长、湖南衡阳人谭天寿当了厅的主任秘书。

我之所以愿意把主任秘书的职务交给素不相识而大有来头的人担任，是因为我预料到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会反对我，但我是一个“事无不可对人言”的人，我把公事乃至私事都彻底公开，而且还有一位大有来头的主任秘书做我的证人，我就不怕他们的反对。

这个方案是富有成效的。我对谭天寿推心置腹，出差期间连私信都托他代拆，很快地他就完全站在我的一边。他对我说：从来没有见到像我这样坦白、廉洁、大公无私的长官。CC 分子和桂系顽固派诽谤我的时候，他就在廖磊面前拍胸口保证我；同桂系特务头子韦赞唐的斗争，他又支持我；甚至有时我同廖磊发生争执，他也支持我——当然是我有理。

吴耕阳还介绍给我陈仲坚（李人俊）、祝青儒（范醒之）和梅安澜。

当时财政厅有两个会计部门：第四科管省财政的收支会计；

^① 据夏沂、孙诗圃回忆，当为李济深。

会计主任管本厅经费的收支会计。李人俊就任会计主任是 1938 年三四月间的事，他当时大概只有 20 几岁，蓬勃有朝气，而作风很细致。吴耕阳告诉我，他思想也很进步。我虽然很少同李人俊谈政治思想问题，但从工作中可以觉察到：凡是进步的措施，他总是热情地参加、推动的。

范醒之初任秘书，后升任检查管理局长。他在任秘书期间，曾去孝感抢运食盐两批，虽运出的不多，但出生入死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他的缺点是急躁，好骂人，这与李人俊的性格有所不同，但两人的关系是好的。

另一位秘书梅安澜，协助范醒之工作。此人有一些规划才能，检查系统的章则、报表、单据等都是由他起草的。建国后在上海见到他，据称在经营茶叶。

一科科长冯晓钟是有人介绍还是投奔而来记不起了。总务主任孙诗圃是投奔而来的，他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参加过闸北暴动，由我的三弟秋阳^①介绍给我，在上海时就在我所领导的中国征信所工作。

二科原任科长石某，是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的。在立煌被敌机轰炸，日寇从背后进攻，廖磊的部队来到，只靠于学忠部队在黄土岭抵抗的危急关头，他带同另一人私自逃跑了。继任二科科长的是科内的主任科员夏际宽（别号竹轩，安徽人）。

三科的情况完全记不起了。

四科科长朱治，系我在杭州高校的同学，是投奔而来的。

投奔而来的还有：夏沂，任皖北渦、亳两县检查处长；后改为第十四检查处。舒铁侯，任助理员。这两人是我的亲戚。舒后来在轰炸中牺牲了。吴正平，任会计员；刘英华（女），参加财

^① 章秋阳原名郁庵，中共党员，曾在周恩来、秦邦宪、陈云等同志领导下长期从事地下斗争。1940 年 2 月被国民党特务下毒谋害。

会组学习后留厅任会计员；他俩是夫妇，吴是我在银行的同事。朱原佑，我被羁押在苏州时的看守所长的儿子，任文书员。王达夫，任秘书，他是我任用的人员中唯一在轰炸中逃跑的。江男俊，救国会同志，工作很好，在桐城县工作岗位上积劳病故了。许汉三，秘书，原在省府秘书处任公报编辑，他愿意投向我，我把他调过来了。任葆真、沈文鑫，均为警卫员，任葆真原省主席的勤务员。

所以，第四个来源虽然人数不多，但有一些水平高的人员。

财政厅撤退到立煌之后，还组织了 30 人的武装运输队，队长是东北人王月汀。这个队大概只有在挖防空洞和建大茅屋时使用过。

李人俊任会计主任遇到过一项史无前例的任务，就是在经费完全公开的条件下为财政厅设置一套正式的经费收支账簿。这套账簿，后任杨忆祖不肯接收，理由便是“史无前例”。

财政厅廉洁的一项铁证是：敌机投下燃烧弹把厅的大茅屋烧毁了，以厅长名义发至国民政府财政部的第一封电报的电文是：现款、证券及簿据无损。这说明管理经费收支的会计主任李人俊、管全省财政收支的第四科科长朱治、管零星用款的总务主任孙诗圃都没有向我谎报分文损失，我才能向上报告没有损失。而在当时，认为在这样的大灾难当中混水摸鱼是天经地义的。在其中，手头现款最多的当然是李人俊。

财政厅还设立收购粮食的“皖西粮食调节处”，下设购粮所，在与敌伪犬牙交错处抢购粮食；还做过抢运食盐、买布、买纸、买药品等业务。为要印刷票照，还办了一个石印房。总之，凡是当时公认为应该做而没有人肯做、敢做的事情，财政厅都当仁不让地负担起来了。

财政厅同新四军的合作，有两件大事：一、在统一税收机构的名义下，财政厅按月补助新四军 3 万元，这是提交省务会议通过的；二、财政厅在武汉订印的省公债和地方银行小额钞票一二

百万元，运到皖南后，是由新四军掩护渡过长江的。

现在记起，安徽来过一个会计长，但没有建立起会计处。还来过一个鄂、豫、皖三省监察委员。我对于这种人都表示欢迎。安徽的财政工作确实是不怕监督、检查的，监督、检查反而可以使工作成绩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大员们所监督、检查的也只能是业务，而不能对我发什么“共产党大肆活动”之类的叫嚣，因为共产党在政府机关里的活动是合法的；只有在军队里，国共双方才有相互不发展党组织的协定。我在政治上所采取的大公无私和对普通国民党员一视同仁的态度杜绝了任何可能的责言。我也没有感觉到财政厅内部有国民党活动。

当时的秘书长朱佛定，江苏江阴人，留法学生，原任广西大学校长，有进步思想。他痛恨蒋介石搞的法西斯的一套，也不喜欢白崇禧的类似的一套，对李宗仁、廖磊比较好。他在安徽时期同我合作得很好，曾告诉我许多桂系内幕的情况，使我减少不少麻烦。我同 CC 系的方诒乃至桂系军阀张义纯的斗争，他是支持我的。我以后遇到他是 1947 年间在台湾，那时他任台湾民政厅长，是当时台湾省主席魏道明邀他去的（不是陈仪留下来的），魏也是留法学生。朱邀我到 he 家里便餐，关起门来同我密谈，认为国民党一定完蛋，桂系也没有前途。

在这里，我愿说一说我对于国民党的看法。深入到国民党的内围留心观察，真有“如入无人之境”之感。那里面，很少有人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更少有人关心国民党的利益；那里面，懂得如何正确地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国民党自己的利益结合起来的，就几乎没有了。无怪乎，陈立夫同何思源谈话，要以“结党营私”为号召了！那里面，几乎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而多数人是可战胜的。一句话，在国民党内部，有的是假国民党员乃至反国民党员。这就是号称有 400 万党员，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国民党不堪一击的秘密。

蒋介石不同意我任秘书长于前而同意我任财政厅长于后，前

后时间不满一个月，这是出于李宗仁的意料之外的。蒋介石当时一定认为，杨绵仲干不了的事情我一定干不好，他是料定我会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从而结束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时也结束了桂系在安徽的统治的。我居然能使安徽的财政在短短几个月内由濒于破产转入收支平衡而略有节余，这又是出于蒋介石意料之外的了。当时由于财政情况的迅速好转，更由于贪污的铲除和浪费的消灭，以至皖西根据地的建立，使得我在群众中有适当的好评。而与我对立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已经到了威信扫地组织瓦解的地步。他们犯了两次逃跑主义：从安庆撤退到六安和从六安撤退到立煌，他们都是背着省政府秘密逃跑的。所以，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听到国民党三个字就表示出鄙夷的神气，而留下来的国民党员也都因此有浓厚的自卑感。他们要想通过组织或发动群众从内部打击我，是完全不可能的。

省党部威信扫地之外更兼人材消乏。省干部训练班教育组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教导主任某致开会辞，他说：“我今天在此地说话，好像鹤立鸡群，引吭高鸣，恬不知耻……”弄得方诒啼笑皆非，递一张条子给他，指使他草草收场。教育厅公文质量之低也是突出的，朱佛定为此还在省政府会议提出了批评。方诒还办了一批临时中学，被称为壮丁逃避兵役的防空洞，学生质量差，教职员的质量更差；曾发生了几起贪污案子，告到省里，由财政厅派员彻查。以后指定学校的会计主任由财政厅委派，方诒也只得屈从。有人告诉我，方诒领导下的省干训班教育组有人对财政厅不满，我立刻请方诒转邀那人站出来公开辩论。结果是消息杳然！

方诒邀请皖北的两个豪绅，住在省党部，在《皖报》上发表谈话，攻击货物检查制度。经我发表长篇讲话加以痛斥。廖磊知道了，认为他们意在破坏安徽战时财政，要加以逮捕。这两个豪绅也就销声匿迹了。

他们也曾试图在省的上层施行挑拨离间，使我干不下去。如